

THE NEW BANNER

# 新旗

第十二期

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出版

定價金圓一卷一角

香港太古船塢李振聲

## 目錄

反對恐怖	振聲
工人階級與幣制改革	林原
戰爭與革命	三男
中共軍事勝利與革命勝利	黎維佛
狄托與毛澤東	連根
給「八一九」被迫害同學	陳維希
編者的話	E. Germain
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問題	黎維佛
中共在機會主義道路上搖擺	
第四國際書記部致南斯拉夫共黨書	

## 反對恐怖

振聲

九月三十日，上海特種刑庭槍決了上海電力公司的工會理事長王孝和。根據特種刑庭的判決理由，王孝和是共產黨員，他「奉了共黨命令，暗中將鐵屑放進發電地軸內，企圖破壞上海的發電機構」。但是據王孝和臨刑前對記者所說的話：「他根本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產業工會常務理事，是從二千八百人中選出來的，這次工人福利委員會要把持工會，竟勾結社會局，警備司令部來誣害」他，所以他對記者「替他伸雪沉冤」。

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們很平靜與很「中立」地報導了這個消息，讓人們自己去判斷，或者讓人家把他當作一段極平常的社會新聞讀過去，根本不判斷。

其實這是一件大事！不僅就工人運動言是如此，便是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或法律言都是如此的。

王孝和案顯然是國民黨的有意誣栽。特刑庭所公佈的理由都是捏造。王孝和是否共產黨我們雖不得而知。但縱令他是，共產黨也決不會命令他的黨徒破壞上海的發電機構，因為這是任情理之外的。再退一萬步講，縱令真有這種事實，那為什麼不公開審判？為什麼不准被告有律師辯護？為什麼不將破壞的罪證公諸大眾？

對於國民黨我們果然不幻想牠真能依循民主方式來對待人民，可是真正想為民主而鬥爭的人，却不能不從王孝和案看出民權之被無情踐踏，因而起來為起碼的人權而鬥爭的。

不過，我們——工人階級的革命者，並不能停留在問題的這一點，我們必須站在階級的立場上，進而探討王孝和案的意義，並指出我們鬥爭的路向。

在國民黨當政的二十一年中，可以說無一日不槍殺大批的工人和農民。牠的統治完全建築在刺刀上，牠的生命全靠無量數工農的輸血來維持。所以從這一點看，王孝和不過是這無數被害者之一。牠的死似乎不值得重視。可是從另一角度看，從戰爭結束後的中國工人運動，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運動的演變看，此次王孝和工友之慘遭槍殺，却具有極大意義。

抗戰結束，上海工人階級從長期的屈辱與消沉中振作起來，掀起了波濤洶湧的罷工鬥爭。這些鬥爭雖在國民黨的鎮壓與共產黨的欺蒙之下，因之未能繼續增高，激成革命形勢，可是對於工人階級力量的團聚，以及工人生活之改善，確已收到了不少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之普遍成立，以及工資按照生活指數發給這二大項目。

國民黨與戰後的工人運動作鬥爭，前後經歷了一個長過程。從日帝投降到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乃是工人階級的全面進攻時期。



這時期以六月二十三日反內戰的大遊行爲其高潮點，但也以此作爲下坡路的出發點。資產階級從那時起開始大規模反攻，國民黨特務的魔手到處伸展。說中國工人的工資超過了美國工人所得的名言，就在那時由假冒偽善的吳國楨說出來的，資產階級的報級也配合着這個攻勢，將中國『民族工業』的不景氣與破產統統歸罪工人們的『美國生活』；甚至民主派與史大林主義者都大聲疾呼，籲請工人們顧全大局，以便『勞資兩利』。

七月間，國民黨特務機構便對工人運動正式開刀了。按收了國民黨內部改良派控制的『勞動協會』，同時又逮捕了各個工會中比較活躍的人員。各個有羣衆的，由工人自己選出來的工會，都紛紛被改組了。工人們的組織力量上受到了第一個很大的打擊。

資產階級步步進逼，國民黨特務加緊控制，最後，到一九四七年之初，乃以一道命令將生活指數凍結。但在這時候做這件事，統治階級還太性急了。半年來的摧殘還沒有完全壓得下戰後八月中壘積起來的工人羣衆的鬥志，因此，隨着同年四月間的物價漲風，上海工人階級在國民黨發動的五一遊行中，發動了一次解凍生活指數的大鬥爭，結果國民黨被迫讓步，工薪重新照生活指數發給了。工人階級的五月攻勢後面緊接着波及全國的學潮，使統治階級時時弄得手忙腳亂，極其狼狽。不過那時終因大部分工會已處在國民黨工運官僚的控制下面，未能配合學生們的鬥爭。等到孤立的學生運動被殘酷地壓下之後，工會就受到了進一步的打擊。首先在最堅強的電力工會中，以莫須有的罪名捉去了許多領袖，然後國民黨又把刺刀轉向其他公用事業的工會，捕捉了好多戰鬥的工人領袖，並且強迫改組了許多略具民主精神的工會。這時候工人的抵抗已經弱了，在這許多被進攻的工會中，祇有法電工人起來作了英勇的抵抗。

法電工人孤軍奮鬥，罷工延長了數日，雖然表演出極高度的鬥志與紀律，然終於在國民黨、法國資本家與流氓的聯合壓迫之下失敗了。從那時——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上海工人階級便再度陷進到無組織與無領導的狀況中，任憑資本家的無厭足的宰割了。

如此，第二次大戰後上海工人階級的第一個偉大的罷工潮，延長了兩年，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告了終結。從那時以後，在鬥爭中

自然生長出來的一大批英勇領袖，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有的消極，以致工人們變成了無首的羣龍。不但無首而已，而且還被迫配了一個國民黨特務的假首，牠用盡一切方法來癱瘓與控制羣衆的行動，使羣衆不敢有絲毫反抗，甚至像最近幣制改革中再度凍結了生活指數，工人們也祇能敢怒而不敢言了。不過雖然如此，戰後上海工人鬥爭的浪潮，只是過去而已，終結而已，並沒有受到慘重的打擊，至少沒有受到像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們所遇到過的打擊。他們的隊伍是完整的，他們的鬥志並未摧毀，他們在階級鬥爭的戰場上是全師而退的。在全國整個不安的局勢中，在經濟不斷崩潰中，上海工人們的再度鬥爭隨時可以到來。有經驗的統治階級自然看得這一點，所以他們要更進一步，要用恐怖的方式對付工人領袖了。

王孝和工友之死，不過是統治階級在需要下所開的第一刀！觀乎二年多上海工人階級與反革命之間的整個鬥爭，王孝和被處死刑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他是爲我們全體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我們工人在戰鬥中暫時受挫的結果，每一個工友都應該懂得這個意義的。

如果我們始終受着國民黨特務的控制，我們始終不努力掙脫這個枷鎖，不設法將自己重新組織在自己的工會裏，那末王孝和的死不會是最後一個的。接着還有更多的工人領袖會受到王孝和的同樣命運。我們要阻止這種恐怖重演，祇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趕快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恐怖，爲工會的民主化，爲工會負責人員的安全保障，爲取消特種刑庭，爲解凍生活指數，爲罷工合法化等等的要求而鬥爭！

十月三日

## 工人階級與幣制改革

林原

國民黨在經濟戰線上的一張最後王牌：幣制改革，攤出在桌子上已經有一個半月了。本刊因爲出版遲延，未能及時批評。現在，這個改革已經實行了相當時期，悲慘的結果業已顯而易見，官方的樂觀欺騙已經無人相信，所以我們也毋須在這方面多所揭發與暴露了。總之，在無法改善的資本主義世界環境內，尤其病入膏肓的中國的經濟體制內，即使以最殘酷的方法壓榨工人農民及一般勞動者



，即使以強暴手段部分剝奪非豪門的中小資產階級，都不能產生一個『巧妙方案』，使這個垂死的經濟局勢起死回生的了。不過在這裏，我們無意憑學理與事實詳細說明爲什麼不能產生這樣的方案。在這裏，我們祇想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指出：統治階級的任何改革方案雖然都命定着走向失敗，但其失敗程度，却完全視我們工人階級對牠抵抗的程度而定。如果我們無言忍受，或竟『衷心擁護』，有似國民黨官所號召的，那他的命運就會好些，反之，我們如果堅決站在階級利益上，不屈地爲自己的生存而鬥爭，那牠就會更快崩潰的。

因此，我們在此地祇願談到我們工人應該如何對付此次幣制改革：

(一) 反對廢止生活指數 改革幣制是在經濟恐慌，準備金不充足，以及破敝的舊基礎上來進行的。統治階級雖企圖用權力來管制經濟，抑平物價，以達到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願。但經濟物價不比同軍隊，可以用指揮刀來如意指使的。最大的困難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尖銳矛盾，不能相容了，又以統治本身的腐化無能，將使經濟愈管愈潰爛，物價愈平愈高揚，加上戰爭上的大量消耗，財政上必然是天文赤字。在這種情形之下；美援有限，增稅不可能，不再增發鈔票，如何維持其統治？通貨再膨脹，反過來又促進物價的直衝騰漲，這是必然的道理。但是工人的生活指數被廢止了，工資被凍結了，難道就這樣束緊我們工人的腰帶，讓資本家來剝削嗎？按照生活指數發薪，這是我們工人在抗戰結束後鬥爭得來的勝利品，前年四月曾經被凍結過一次，去年五月又給我們爭取回來了，雖然被打了個折扣，雖然是由統治階級自己來編訂，但總比凍結好得多。現在又給統治階級在改革幣制的炫耀之下，廢止了，這對我們工人的生活是一個大威脅，大打擊，我們工人是根本不能緘默的，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高着嗓子，揮着拳頭來反對，要求繼續維持按生活指數發薪的辦法，並且由工人們自己來編訂。

(二) 反對解雇遣散 幣制是改革了，但外匯管制嚴，原料不易進口；工貨停止，利息又低，告貸不易，資金週轉不靈；加以市場狹塞，購買力低弱。這樣一般的工商業家，還是不易站得住脚

，今後縮小營業，減產停產的現象，將更加劇。解雇和遣散工人，自然又愈來愈多了。被解雇和遣散的工人，當然是一個大不幸，而任業工人，也是一大威脅。因之，在業工人與被解雇和遣散工人應聯合起來，反對解雇遣散，要求有能力的工人都應該給他工作。如果沒有這麼多工作，就應該把任業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讓失業工人共同工作，而工資仍照原數發給。

(三) 公開大資本家賬簿 自然，將在業工人工作時間減少，讓失業工人都能就業，這在個別資本家方面，將自願把賬簿公開，說明他實在虧累，不能負擔。我們工人對個別資本家的賬簿，不感興趣，因爲這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中對個別資本家的不幸。我們工人所要求公開的所有資本家的賬簿，尤其是大資本家的賬簿。揭出他們的過分利得，過分浪費，以及他們的囤積物資與高抬物價的罪惡。因而無條件徵取他們的利得，運用公私停產和關廠的房廠，開辦公共事業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收容失業工人。

(四) 成立消費者代表會 物價是當前剝削工人生活的最大敵人，也是大資本家剝削工人最兇猛的武器，我們工人必須聯合士兵，農民，以及低級公教人員，小市民，和家主婦等，來組織消費者代表會，澈底檢查所有資本家倉庫，切實掌握物資，有效平抑物價。當然，統治階級會對我們工人說：政府已成立有物價委員會，已宣佈檢查倉庫，用不着工人們來勞動了。我們工人堅決反對這種說話。統治階級的物價委員會和檢查倉庫都是虛偽的，欺騙羣衆的。他們限價，是跟隨黑市的尾巴來欽定物價，或以服務爲名，以保障資本家利益爲實。至於檢查倉庫也是一樣只是拍幾個蒼蠅，打幾只有財無勢的老虎，藉以中飽豪門吧了。我們工人切不可上統治階級的當。

(五) 爭取罷工自由 以上這些要求，是與資本家的利潤慾兩不相容的，除非靠工人自己的力量，用罷工的方法爭取，是不能實現成爲事實的。從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罷工是工人保障生活，維持最後一口飯的唯一武器，罷工是合法的，現在被統治階級禁止了。縛住工人的雙手，一任資本家壓迫剝削，這是合理的嗎？工人們必須聯合起來，爲爭取同盟罷工而鬥爭。無罷工，就是無生活；不自由，就不能生存。



## 戰爭與革命

### 尊一

世界局勢的發展，真比最悲觀的預言還要可悲。第二次人類大屠殺的『法理和平』尙未來到，即聯合國對德日的和約尙未簽訂，可是，新的，第三次的人類大屠殺，却已經彷彿是頗爲現實的了。資本主義真是一個不斷戰爭的制度。如果不把這個制度推翻，人類終於是要在這無窮的集體殺戮中毀滅乾淨的！

可是現在，大多數的人們是陷進可悲的宿命論中了。他們覺得，人人不願戰爭，而人人不得不接受戰爭，於是他們無可奈何地等待了，等待那無可避免的災難的到來。

其實這是大謬不然的。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戰爭不是自然現象，牠是社會現象，是資本制度的產物，是可以避免的。其次，我們要知道，即使就目前這可悲的局勢看，表面上雖是要戰雲四合，熱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可是按其事實，無論美帝或莫斯科官僚，都不會決心作戰，雙方都還在準備的階段。同時最重要的，各國以工人爲首的反戰勢力，雖然多少受了一些挫折，但是還是堅強存在的，他威脅着美蘇雙方，使他們不敢放手作戰。他們必須事先壓平了這些勢力，才敢正式開火的。

因此我們相信，現在決不是我們悲觀的時候，還有很大可能可以阻止那毀滅人類的新戰爭呢。問題祇在於人們認識清楚，趕快參加並發動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 中共勝利與革命勝利

### 三男

國共內戰進入了牠的第三個秋季。縱觀戰局，國民黨在軍事方面確實是愈來愈沒有辦法了。共產黨發動攻勢還不到一個月，而情形便變到了這樣一個地步：濟南丟，太原危，關中緊，東北死，華北窮蹙。如此下去，國民黨要扭轉局勢固然是幻想，便是要支撐危局都是不可能的。再過一年半載，恐怕大江以北，國民黨將只能保持幾個像目前長春一樣的孤島了。

就目前各種情形看，如果美國不親自出兵，那末中共之完全控制東北與華北，將成爲無可避免的事實。換句話說，中共業已在內戰中獲了牠的局部性的勝利，這種勝利趨勢，在內戰沒有化成實際

的國際戰爭之前，多半是不會改變的。

有些人閉着眼睛，連這個顯明的事實都不能見或不願見，那末他們無論站任什麼立場，都是十分錯誤的。

革命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必須面對事實。我們雖然完全不贊同中共的政策，却不否定這種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們不能事不在於掩飾或蒙蔽，而在於明白理解：中共爲甚麼在軍事上會勝利？並且追究這個勝利是否等於中國革命的勝利？

第一箇問題的解答很簡單：牠一方面由於國民黨統治的徹底腐朽；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土地問題相當採取了改良政策。

第二個問題說起來長，不過我們在這裏仍必須簡短地回答牠：中共勝利絕不等於中國革命之勝利。何以故？有如下原因：一，中共的領導層是這樣一種組織，牠必須大部分代表蘇聯官僚統治利益，小部分才代表牠在國內所依賴的階級的利益；二，牠在國內大部分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與『新式』富農的立場，實質上是反對勞動者，尤其是反對工人階級的（因爲牠主張勞資合作）；三，牠的土地改革是動搖的，不徹底的，隨時可以取消的；四，中共無論在黨、政、軍內機構內，都是絕對沒有民主，實行警察統治，殺戮一切有批評精神的革命者；五，中共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無論牠是那一種牌子，要想使中國有革命的改造，那都等於緣木求魚。

## 狄托與毛澤東

E. Germain

我們從來不斷地說，史大林絕對不是想把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推廣到全世界，他根本是要跟世界的帝國主義謀得妥協。狄托事件主對我們的分析給了一個最好的證明。牠無可辯駁地表示出：史大林義要想無限制地擴張是如何的不可可能。

克里姆宮與其他『執政』的史大林黨的關係，隨這些黨所獲得的羣衆信仰的大小而改變着。很明顯的，史大林一方面很高興看見毛澤東的軍隊能困住蔣介石的軍隊，——這在史大林手裏是張有力的王牌，可用以和華盛頓從事買賣，可是另一方面，他看見毛澤東方面的任何一個確定的勝利，都愈來愈不安了。假使狄托，在南斯拉夫那樣小的國家中，已經敢於反抗，那末明天中共控制了中國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又將採取怎樣態度？史大林主義愈加擴張，牠就造成了愈加強大的離心力。

共產黨愈加想去保持羣衆基礎，他們就愈要感受到工人的壓力。他們愈加顧慮到工人的情緒，他們就要以較大力量符合於各自國家中的社會情形——同時對克里姆林宮的嚴格控制便愈要獨立起來。

因此，史大林不但要除去彼德可夫，米可拉席克與馬克薩里克等人，而且還要設法除去與工人運動有最密切關係的史大林派領袖，要用一些單純的傀儡，完全依賴克林姆林宮而當權的人，來代替前者。因此史大林要試行在羅尼亞，匈牙利，波蘭等國的史大林黨中，把那如像鮑達拉斯在本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絕無歷史，但在俄國生活過一二十年的人，置於顯要地位。因此，在東德，他特准了，甚至鼓勵了一個新的中等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的產生，替他去平衡史大林主義的統一社會黨。（節譯自比利時工人鬥爭報）

#### ▲本社出版書籍

俄國革命史 托洛次基著 定價五圓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次基著 定價三圓  
自傳 托洛次基著 定價一元五角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定價五角

### 給八一九被迫害的同學

陳維希

『八一九』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將它底血手伸向進步的青年學生的一天，和『二七』、『四一二』一樣，塗寫在資產階級底血衣上，意味着歷史性的悲劇，也意味着更沉重的仇恨！

戰爭無止境的拖延，資產階級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臨於潰滅的境地了，這就是六月以來金融與財政的全面崩潰與『和謠』心理的背景。但資產階級政府在這個當兒，得到了『美援』。中國資本主義社會局部的危機為國際資產階級的援助而得到苟延殘喘的機會。這使它像打了一支強心針一樣興奮起來。一面重申『剿匪』決心與『改革』幣制。一面來一個空前的大迫害——『八一九』事件。

暑假以來，資產階級政府就從四面八方佈置了迫害的天羅地網，報紙上大吹大擂其『職業學生』啦，發表『共匪間諜製造學潮』

『開關第二戰場』的經過啦。中大李朱華三同學被捕啦。各中學大學普遍的開除啦，這都是暴風雨行將降臨之前隱約的雷聲。不久，在緊接着的八月十九日清晨，南京特種刑庭便向中大等校發出傳票一四七張，北平特刑庭向北大清華等十二校發出傳票二五〇張，次日北平特刑庭發佈關於六六位逃亡同學的通緝令。同一天天津開始逮捕，入獄的同學六十四人，成都一十九人，二十四日北平被捕的同學即有七十六人之多，上海大迫害始於二十七晨，兩日內搜捕到六十六人。這一次大逮捕表現得無比的慘酷與陰險，警察封鎖了學校與外面的交通，特務跟蹤着同學們的行動，他們一直任學生宿舍及同學的家，橫加威脅與搜查，對那些逃亡或本先離校的同學加以『通緝』。務使那些富於理想與革命氣質的優秀學生，掃除竭盡，以便於他們製造最標準的奴才！

我們站在中國工人的立場，完全同情同學們遭受的迫害，不過在同情之餘，我們還要就我們所見，給同學們指出過去學運的缺點，與今後應走的方向。不錯，在過去一切民主運動中，我們學生曾經發揮過強大的團結意志與鬥爭精神，表現了力量。但是，為什麼這種運動一天一天走向低潮，得不到新的發展。一天天來得孤立，一旦遭受到打擊的時候，却沒有一點反抗的力量呢？果真我們過去一切的努力盡成泡影嗎？為什麼我們得不到更廣大的市民羣衆的支持與援助呢？假如有缺點，那麼缺點又在那裏呢？我們，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立場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如下的一種認識與批評。

首先，過去的學生運動是脫離了城市工人與廣大的城市貧民，而完全着重在對知識份子的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不錯，知識份子，尤其是這些富有革命熱情的學生，那懂得『向羣衆學習』。『走向羣衆』、『打破小圈子』等等口號。但是，由於學生生活所局限與某種意識形態的播弄，使他們覺得他周圍的那一羣自由份子，中間路線的人物是唯一的『羣衆』。而主要的工作是找他們談話，開討論會，讀書會，拉拉票，組織社團等等。而所謂『打破小圈子』則主要是兩個人愛情上的小圈子或一羣有特殊關係人物的小圈子。這是一種致命的而同時又是普遍的錯誤。羣衆必須是那些革命的羣衆，城市工人與貧民，至於圈子，乃是知識份子的小圈子，意即對



自己『階級性』的突破！

過去學生的工作，既然脫離了城市的革命階級與羣衆，當然得不到他們的援助。這裏所謂援助，我們無須希望那些『自由份子』和『中間份子』會援助這些被迫害的同學，援助是意味着一種肉搏。而徹底的援助與徹底反逮捕反迫害，無疑的只有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才行，能夠做這事情的只有城市工人和更多更廣大的貧民，他們掙扎在死亡線上。同時，中國的革命事業，必須有人數衆多內與自覺的知識份子，不斷的投入無產階級的行列，成爲革命的火種。尤其在資本家社會危機已達到頂點時候，即其無能與殘酷性達到頂點的時候。知識份子投向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行列更成爲普遍的現象。但可惜得很，由於史大林主義風行一時，這種意識形態與知識份子的劣根性結合起來，變成了他們走向社會主義運動行列的鐐銜。在目前，進步的知識份子跑『解放區』雖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但這在我們中國工人的立場看來，是一種莫大的損失，而在歷史與革命的觀點去考察，那是一種無可饒恕的錯誤！

但是大迫害已經開始了，對於你們，這一羣被迫害的青年戰士，毫無一點幸災樂禍的心理。反之，我們堅決的相信我們將於不久的將來——縱或不是馬上——能用革命的鐵拳，擊碎資本主義社會『人間地獄』底圍牆。只有我們才能澈底的解除你們的鎖枷。同時，我們必須忠告那些被通緝的正在逃亡的同學：假如他們不是爲了逃避現實，而敢於正面現實，則必須檢討過去錯誤的認識與工作方向，這只有在理證上完全接受唯物論辯證法的洗禮。在實際的鬥爭中和城市工人及城市無產階級者羣衆結合起來，認清今日罪惡的泉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解放中國以至全世界。

其次，那些沒有被傳訊與被捕的同學不要以爲從此『太平』。資本家政府臨死前掙扎的殘暴，是無法可以預料的。假如你們相信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造福於中國與解放全人類，那麼，你不能因爲環境的惡劣而放棄你的理想，甘心做一個資本的奴僕與僧子手。反之，假如你看見歷史道路無比的光明，認識資本家社會必然崩潰及即將被顛覆的事實，又確定只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專政才是真理的方向。那麼，願我們緊握着同志底手，在一個更新的革命的

旗幟之下勇敢前進。

最後，在這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我們謹向全國各地被迫害的學生，致戰友般的同情與援助之意。（完）

（以下接第十六頁）

而這些行動是必須批評的。現在我們寧可着眼於你們這次抵抗中的希望——即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反對巨大的官僚機構，能獲得勝利——那個官僚機構在勞工運動中是空前可怕的，即克林里姆宮的機構。

我們不久將寫一封公開信給你們和你們的大會及所有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其中將以我們的觀點詳細商量討論你們和莫斯科及其情報局衝突的歷史意義。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第四國際書記部

巴黎一九四八、七月一日

## 編者的話

不幸得很，我們這一次還是脫了期。雖然脫期多半是由於許多無法克制的原因，但我們却更願意把主要責任諉諸自己，我們今後無論如何要克服一切困難，至少要把二月一期的諾言充分實現。

這期，我們原來要使牠成第四國際大會的專號，專門登載第二次世界大會的決議，可是因議案原文寄到過遲，二因譯事發生了一點障礙，所以本期仍只能照普通方式出版了。至於下一期是否專號，我們不願再做預言，因爲有太多的技術困難，簡直叫人無法預告。

本期中有好幾位新的朋友替我們寫文章，這是一個好現象，我們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朋友投稿，使『新旗』的篇幅更加充實。

朋友們的盛情是可感的。在過去的二三個月中，不僅有無數次關切的詢問，而且有不少的捐助，茲將捐款諸君的姓名開列如下，藉誌謝忱：

唐中流先生	一元	無名士氏先生	四十元
陳大德女士	二元	張先生	二十元
王阿大先生	十元	戴世安先生	二元



# 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問題

——犀照草案的批判

連根

犀照是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的二派之一——即「新鬥爭派」——的領袖。四個月前，他給第四國際未來的中國黨起草了一個基本文件：『黨綱草案』。這草案已經為該派的中常會所通過，且將提出在該派所擬召開的『建黨大會』上，準備批准以後作為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的指導方針了。

托洛次基主義運動在中國已存在了二十年。一九二九年托洛次基配合着中國托派的真實力量及其需要，曾經給我們起草了一個簡短的綱領。這個綱領，在一九三一年的四派統一大會上，曾經略加擴充，予以通過了。統一大會到現在已經十七年，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國際的左派反對派亦早已變成獨立的第四國際。因此，很顯然的，一九三一年的綱領到現在已經有許多過時的地方，我們必須加上修改，或者重新起草了。

所以犀照這一企圖的本身，原是應該歡迎的。不過，犀照用以寫作這個文件的那個思想，依我們看來，却萬分不幸，竟是他一貫錯誤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立場之徹底發揮。牠與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無緣，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立場恰成了直接的對立。這樣的思想，當然不能被規定為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的根本準繩，而是應該予以無情打擊，堅決加以排斥的。

為此，我們不得不對全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以及接近托派立場的革命者，鄭重的提出我們對犀照草案的批評，同時，我們極願意看到同志們對我們的批評的批評。集思廣益，互相切磋，這樣才可以產生一個正確而美滿的中國第四國際黨的革命綱領。

不過爲了時間的匆迫，我們這兒的批評只能就犀照草案的基本精神，作一些扼要的揭露與分析。現在且讓我們從草案的結構講起：

## (一) 根本出發點就錯了

草案的第一個分題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社會經濟及其矛盾』。犀照以一個歷史教授的姿態，將中國的近百年史，很詳盡地寫

進在『綱領』裏了。當然，歷史的眼光必須的，要明白中國目前社會的『經濟及其矛盾』，也確實非明瞭近百年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不可；但若僅僅抓住了中國一國的歷史，忽視了世界的歷史，那末這樣的歷史眼光便是鄙陋的，村夫子的，因而是錯誤的。人知道，中國的近百年史乃是世界近百年史的一部分。世界近百年史是一部資本主義生長，擴展，衰朽與掙扎的歷史，而中國百年史則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其生長，擴展，朽衰與掙扎中所影響與所作用於中國的一連串事實。因此，要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如果撇開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總歷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中國社會的經濟及其矛盾，如果離開了資本主義的世界行程是不能正確的。可是犀照正這個草案中所應用的歷史處理法，恰好是把中國孤立起來，『平鋪直叙』描寫了中國之如何被侵略。至於那個侵略中國的侵略者呢，則是抽象的，並無發展的，百年來無大變化的『帝國主義』。其實一百年來，『帝國主義』的變化才多哩！在其生長，擴展，朽衰與掙扎的行程中，在在變化着牠的侵略手段，改變着牠對世界落後國家的控制方式，改變着大國間的互相關係，最後也改變着殖民地國家所能發動的鬥爭與革命的性質，改變着殖民地民衆所應負擔的歷史任務。說得明白些：在資本主義的生長時代，這些幼稚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關係，因爲主要採取着商品輸出的形式，走着商業侵略的路，所以牠的壓迫在形式與實際上都是民族的。即帝國主義者直接派遣了冒險家，軍人，政客與牧師，通過少數漢奸買辦，對『整個』被壓迫民族施行經濟，政治與軍事的壓迫；同時在帝國主義方面，又因各自的力量比較平均，爭持比較有力，所以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性革命』有了較大的成功可能；資產階級的獨立國的前途也尚未完全失去；日本便是趁着這些條件的便利，由半殖民地變成爲獨立國，更由半獨立國一躍而爲帝國主義的。可是到後來，到了世界財政資本的絕對統治，帝國主義主要以過剩資本向殖民地輸出，與殖民地資產階級締結了有機聯繫的時候；尤其到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的現在，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十分簡單了，財政資本不僅拿牠的力量征服全世界，並且將其制度與關係普及全世界的時候，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壓迫却只在極小意義內是民族的而在極大意義內成爲階級的了。因爲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資產階級有機地結合起來，士著資產階級成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合作者，而帝國主義則成了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一個積極參加者了。因此，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便提出來了，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公式便愈加名不虛傳了，而資產階級獨立國的前途，便成爲泡影了。

犀照完全不懂得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此種歷史的與辯證的互相關係，並不能從帝國主義的世界來觀察中國問題，於是根本的出發點便完全錯了。從這個錯誤立場推演開去，他自然不正確地懂得中國的社會經濟及其矛盾，也不能正確地懂得由此矛盾所應提出的任務。結果，整個草案便陷入深不可拔的錯誤的泥淖中了。

### (二) 不答覆一個必須答覆的問題。

如果孤立起來看中國的社會經濟及其矛盾，那末中國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之故，最大禍害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足，在於封建及落後關係之猖狂作祟，這些話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所以民族主義者無一不相信中國的『封建統治說』，而相信『封建統治說』者又無一不主張『新民主主義』或『三民主義』。此無他，這三種看法或主張，實有其邏輯的一貫性在。同時，從反面說，凡是從國際主義的眼光，從世界革命的立場來看中國問題的，則類多能看重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甚至金融資本主義關係及其勢力的統治，並由此出發，主張中國的不斷革命論，亦即社會主義革命論。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究竟是一種勢力佔優勢這問題，二十年來成了史大林主義者與托洛次基主義者之間的主要爭論，可見並不是偶然的。這個問題太重要了，牠先行決定着中國革命中許多戰略的與策略的問題。預備作爲中國革命黨的綱領的文件，當然，一定要給牠一個完全明白與絕不含糊的答覆。

那末犀照在他的草案上是怎樣答覆的呢？他根本不加答覆。他隻字不提。疏忽嗎？不是的，事實上他只是避免作簡明的答覆，而同時却在敘述中暗地裏答覆了。在整整一章的敘述中，犀照就只着

重在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窒息作用，着重在城市與鄉村中的種種『前資本主義的』與『封建式的』社會關係與剝削方法。他雖然沒有說到誰統治誰。可是字裏行間，他却清楚地給了人一個觀念：封建式的與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是佔着統治地位的。他把中國目前『五大家族統治』控制着的金融獨佔資本，也跟在民主派與史大林主義者的後面，描寫成『官僚資本』，是『中國的歷史傳統』，言之外音即是『封建的』！『單獨一國』的經濟分析，就這樣地走到牠合乎邏輯的錯誤結論了。

### (三) 『首尾不相應』

不承認中國的社會經濟係由資本主義關係占統治地位，在政治上會有怎樣的結論呢？不承認這一點，能夠同時提出不斷革命論來嗎？承認了目前中國經濟中的『封建』優勢，能夠同時確定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嗎？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幾個問題。不爲了省事起見，我們馬上就請托洛次基出來吧。在『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托洛次基反駁布哈林的『六大綱領』時說：

『假使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判斷的，中國經濟生活的真正統治者是封建殘餘，那便無望了』。『草案中說：

『中世紀的封建關係在中國國內經濟中和其上層政治建築中都占統治地位』。

『這是根本錯誤的。什麼叫做統治呢？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數量而定呢？抑或按照在中國經濟上所起的統治與領導作用而定呢？以包羅全國的商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作用爲基礎的國內工業，非常迅速地發展；重要農業區域之完全依賴市場；巨大的與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的作用；中國農村在各方面之隸屬於城市；——所有這些都顯出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占優勢和直接統治地位。封建與半封建的社會關係無疑是強有力的；然而這並非『封建的』；——關係底統治，而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底統治。正因爲這種資本主義的關係占主要地位，我們才能夠真正地說到中國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領導的遠景，否則豈不是首尾不相應嗎？』

（見中國革命問題一九〇頁——末三句的圈是我們加的）我們引證了托洛次基的文字，並且在最後幾句上特別加上了圈



，因為在這個地方，我們與犀照對不斷革命論的認識開始發生分歧了。在我們，完全同意着，而且十分看重着托洛次基這一個意見；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未來革命中所以能有領導的可能，不僅由於國內外鬥爭關係的客觀需要，也由於中國資本主義關係占優勢這一主觀原因。可是在犀照，問題恰好相反，他以為只因中國的社會經濟十分『封建』，因為前資本主義關係統治着中國經濟，中國迫切需要一次民主革命來解放生產力，來發展民族工業，所以無產階級應該領導革命。

這種說法，『豈不是首尾不相應嗎？』

為使首尾能夠相應，犀照首先必須改變他對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認識，否則，他勢必要丟開這個首尾不相接，勉強嵌進去的所謂無產階級領導的。將來的歷史會證明給我們看的。

(四) 反資本主義的民主任務與反資產階級的鬥爭

一個錯誤必然會產生出另一個錯誤。既然對社會經濟他沒有承認資本主義關係的優勢作用，犀照便十分自然地，肯定了中國革命中民主任務的純粹民主性。論到革命任務，犀照只是抽象地，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封建形式的剝削這二個前提中，得出了民族獨立與土地問題。至於這兩個任務，在目前世界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的具體結合中，在中國各階級的具體關係中，應該具有何種性質，犀照就完全不提了。犀照的民主任務是按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抽象公式提出來，而不是從世界以及中國真實的階級關係中提出來的。因此他始終不懂得，置於中國民族之前的這兩個民主任務，其實與過去許多國家（甚至包括俄國）的民主任務不同，是反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並非像存在於犀照頭腦中的一樣，是純粹民主主義的。

中國的反帝鬥爭與土地革命為何與如何帶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性質，托洛次基的文字中說得太多了，我們不想在此多說。這裏我們所要着重的，乃是不認識這個反資本主義性質，在政治上會有怎樣的錯誤影響。

關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與階級關係，托洛次基有過一句言簡而意賅的話：『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基本的農業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發生了有機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

是有機地不可分離。』（見中華問題二三九頁）這句話，犀照在他的草案中自然是引用了。但他引用的意思，簡單地為了說明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妥協性和反動作用』。他完全不能從這個命題，得出應該得出的結論，即：中國民衆要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必須反對資產階級的；要解決土地問題也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換句話說，中國的反帝與土地這兩個任務的解決，必須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因而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也就是說，不是簡單的民主主義的。

犀照因為強調了中國民族鬥爭與土地鬥爭的『民主性』，不見，或者不願意看見這兩個任務的反資本主義性。所以他一從問題的經濟方面轉移到政治方面，便只能普泛地說明『中國資產階級也希望本國的資本主義能有獨立發展的』（注意，這是在二十餘年中國的階級鬥爭與二次大戰之後說的！），不過他們希望得不徹底，所以不能負擔『解決中國革命民主任務的使命』因此，這使命『自然然而地落在青年的無產階級肩上了』。

其實，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真正綱領，最低限度必須寫着這樣的話：『不管中國資產階級本身還存在着怎樣的意圖，但由於國際與國內的階級鬥爭的驅使，中國資產階級只能拼命維持着帝國主義（特別美帝）對中國的統治以及鄉村中的封建形式的剝削，才能保存其地位的。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以及革命民衆，如想解決民族獨立與土地問題，必須首先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除去資產階級這個最直接的障礙物。』

犀照在草案上沒有這樣寫，他是絕對不能這樣寫的，因為在他的心目中，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一方面是美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封建勢力』。至於資產階級，那不過是一個不根本的與妥協性的同盟者吧了。

在這裏，我們與犀照之間主要的戰略路線的不同，可說是暴露無餘了！

(五) 民主革命沒有過去？

由於不認識民主任務的反資本主義性，犀照便宣布未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是從『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他又說：『認為民主革命已經過去，未來的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也是一種無望的教派主義的空談。』



感謝犀照，他這次用了十分明白的文字，將自己的『不斷革命論』給我們完全寫出來了。黑字寫在白紙上，犀照的意思是未來中國革命最初將是一次『民主革命』，因為民主任務沒有完成，『民主革命尚未過去』。祇等到民主革命勝利之後，革命才能『不斷地生長成社會主義的』！

二十年來托洛次基用了巨量文字，和史大林與布哈林爭論了關於中國未來革命的性質問題。托洛次基的目的自然不是想說服史大林，他只希望年青輩代的革命家懂得：以『民主任務未解決』，『民主革命未過去』的藉口來否定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不對的。可是現在證明托洛次基的希望是落空了，『民主革命尚未過去』的字眼，赫然寫進了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草案七』！

民主任務未解決是一回事，但民主革命之是否過去却又是一回事。中國的民主任務當然沒有解決，可是民主革命呢？告訴犀照，都是確確實實已經過去了。這些民主任務之解決，今後只能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中附帶地完成了。犀照顯然是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的，那末，我們又早的了節省文字起見，請犀照讀一下大大有名的列寧的四月提綱吧：

『二，俄國的國家政權已轉入新階級手裏，即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清箇範圍內，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請問犀照，中國的國家政權，是在什麼時候轉入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的？至少有二十年了把！那末你憑什麼說：我們的『民主革命尚未完結』與『尚未過去』呢！這裏到底是證明了列寧的『無產階級教派主義空談呢』？還是證明了犀照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廢話』呢？

犀照有個最得意的論據，用以反對我們的，那是：如果說，中國的民主革命業已過去，因此第三次革命一開始便將是社會主義性的，那末中國革命不是『斷』了？不斷性還在那裏？其實犀照這個似是而非的論據，也是根源於他弄不清民主任務雖未解決而民主革命却已過去這個簡單的道理。古典意義，或者，科學意義的『民主革命』，不僅指着任務之民主性，而且多少意味着動力之『全民性』，換言之，即意味着鄉村與城市資產階級多少參加着，甚至領導

着這個革命的。可是這樣的『民主革命』，隨着資產階級之從反對黨地位轉入執政黨地位，隨着鄉村中農民階層的分化，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宣布牠是過去了。當然，民主任務並沒有解決的，但資產階級非但不能解決這些任務，而且成爲此種任務解決之主要障礙物了。要解決牠們，絕不能聯絡資產階級，而必須直接反對這個階級了。因此，中國民主任務之解決，不能希望靠一次民主革命，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反資本主義的，亦即社會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站在民主要求（民族獨立亦爲民主要求之一）的基礎上，聯絡了國內廣大的城市貧民，打擊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勢力，奪取政權，藉以完成民主任務與走向社會主義，這便是我們所了解的『不斷革命論』，也就是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牠與犀照的所謂『從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斷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我們，中國未來的歷史中不會發生什麼民主革命，無產階級站在民主與民族的要求上，爲奪取政權而鬥爭，而革命，這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因爲牠在無論那一方面都是直接打擊資產階級的。在犀照，中國如果有革命起來，最初祇能是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領導權應該操在無產階級手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與妥協的。這革命一方面反對落後的封建（民主），另一方面反對主要敵人帝國主義（民族），無產階級因爲鬥爭得最堅決，得到民衆同情，於是得到了政權，然後，『直接地與不斷地』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堅決地動搖城市與鄉村的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

這不是截然劃分的兩條路線嗎？

現在是否還有人會覺得犀照與我們之間不過是字面上的差別呢？如果有人這樣想，那我們必須再請他注意這個基本分歧點：我們的基本方向是始終反對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資產階級，而犀照的路線是主要在資本主義（或民主主義）的範疇內，反對『封建』與帝國主義。因此，根據我們的路線，中國無產階級能夠在未來革命中走上政權，將革命不斷地推進；但若根據了犀照路線，則中國無產階級又只能替『民主的』與『民族的』資產階級做一番『堅決的』苦力，使革命中斷在『民主階段上』吧了。

（六）『不斷論』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性說

由於中國民主任務與民族任務之帶有反資本主義性質，又由於



中國資產階級早已霸佔了國家政權，所以中國最近未來的歷史中，不發生革命便罷，假如發生了革命，則一開始就非帶有社會主義性質不可，即必須是反資本主義與反資產階級的。誰若宣佈這個認識爲『教派主義的空談』，並且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綱領上嚴加排斥，則將被證明爲殺死未來革命的一個最有力的絞索。

在這裏，我們略略回溯一下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似乎不是多餘的。當一九三〇年，中國四個托洛次基派進行統一協議，本文作者最初被推起草一個綱領。在草案上，關於未來革命的性質，我們寫上了『未來革命一開始便將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話。因此惹起了許多同志，尤其是犀照的猛烈反對。依這些人的意見，未來革命最初將是民主革命。爭持結果，後來由獨秀另外寫一個草案，關於這問題，以如下的話謀得雙方意見的妥協，即照抄了托洛次基的原文，聲明中國未來革命，『將一開始便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與鄉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這個草案後來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開的統一大會上通過了，作爲中國托派的正式綱領。

現在，犀照在企圖重寫一個綱領，那是在中國經歷了十八年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之後來重寫這個綱領的，按理，他該不再反對『一開始社會主義』的命題了，可是事實不然。在這個問題上，他却大大地退後一步，聲明未來中國尚須經過一次『民主革命』，才能『直接而不斷地生長』到『以最堅決的方式去動搖與取消城市與鄉村中資產階級財產』的革命了，真正令人有『夫復何言』之感。不錯，犀照在附帶的說明中，以十分緩和的改變形式，還是將托同志的老話寫了進去，他寫着：『在革命初期，反富農的鬥爭和動搖某部分資產階級（當然是『官僚資本』了——根）的財產關係將表現出來』。不過這樣一來，更加表示出犀照意見的矛盾，或證明牠對托洛次基意見之完全不能了解。所謂『革命初期』，是否就是革命『一開始』之所謂？『反富農與動搖資產階級（即使是某部分）的財產關係』，是否就是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承認了『革命初期』就要反對富農與動搖資產階級財產，另一方面又宣布了未來革命將首先經過民主革命，這中間的矛盾將如何解釋？

犀照也許會以爲『反富農的鬥爭』仍舊是民主性的吧。若然，則請讀讀列寧的文章：

『最初，革命運動是聯合着全體農民，反對皇朝，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的落後制度，在這個限度內，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然後，革命運動聯合了最貧農民，半無產者，以及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富農，鄉村壞蛋與投機商人都反對的，在這個限度內，革命便成爲社會主義的了。』（見『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次基』）

農村中是否反對富農，依列寧說，竟是革命是否已變成社會主義的一個標準。犀照同意這個說法嗎？

列寧似乎預先知道了我們中國將會發生這樣爭論，他對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給我們下了如此含糊的一個定義。我們希望，憑這個定義，許多青年朋友能夠認清楚犀照關於民主革命的一切胡言亂語了。

（七）

對立的排比

至此，我們已經盡了責任，將民主主義者犀照身上披着那件『不斷革命論』的外衣，總算剝下來了。犀照草案所一貫遵循着的那個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我們已經充分地，雖然還是約略地，批評過了。但爲了讀者更加明白起見，我們還得將犀照草案所代表的與我們從來所主張的二條對立路線，對照着排列如下：

犀照的：不肯定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經濟中占統治地位。認爲由異族壓迫與封建剝削所引出的反帝與土地鬥爭這二個任務，是完全民主性的，所以中國將來發生的將是一次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祇因資產階級不能徹底行動，所以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然後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我們的：明白肯定中國的社會經濟受着資本主義關係，甚至是金融獨占資本關係的統治。認爲由帝國主義壓迫與落後關係作祟所引出的反帝與土地鬥爭這二個民主任務，帶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更因爲這二個阻礙中國發展的勢力，均由資產階級的政權加以保障，故中國未來的革命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性的。在此革命中，無產階級所率領的革命力量，將直接與正面地反對着以資產階級爲首的反革命力量。革命必須首先推倒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任務。



從這個排列中讀者們可以看得很明白：前一立場是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的，階段革命論的；而後一立場則是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然則，犀照草案能否成爲第四國際中國黨的綱領，已經毋須我們多說了。我們必須羣起攻之，使這種躲藏在托洛次基主義偽裝下面的門雪維克主義，不能在我們的隊伍中存在發展，更不能讓牠作爲我們運動的指導路線！

#### (八) 民主革命與過渡綱領

批評了犀照的基本路線，我們便無意再去指摘他從此派生的錯誤。因爲，從一個根本不同的視角出發，對一切枝節問題都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看法；而根據了這一個不同的看法，枝節問題上的錯誤是不難自明的。

因此，對於犀照草案後半部的『過渡綱領』，我們不再逐一批評其條文了。

這裏我們還想談一點的乃是『民主革命』與『過渡綱領』的關係。我們要從犀照草案中包含『過渡綱領』這個事實本身，來暴露他民主革命論的謬誤思想。

犀照說：『過渡政綱是當前的『民主主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這兒他顯然是想借用托洛次基正『過渡綱領』裏的

## 我們的政治主張

(一) 立即停止內戰：——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國帝國主義討伐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隊，反對征糧，征稅，征兵！

(二) 澈底改善與保障工人生活：——按生指數十足發給工資；職工代表自編生活指數；八小時工作制；工會領導機關民主化；反對國民黨黨棍控制工會；工人管理前敵僑工廠；工人監督『國家銀行』與『國營事業』；救濟失業；確保罷工權；取消一切反對勞動者的法律！

(三) 沒收土地歸貧農：——切實沒收地主與富農土地。由全體自耕農，貧農與雇農組織土地委員會加以管理，由各成員分種或集體耕種；打倒高利貸；取消一切苛捐雜稅！

(四) 軍隊民主化：——一切軍隊(不分國共)立即成立士兵委員會；澈底改善兵士生活；廢止一切等級，特權，壓迫與侮辱；革

話來證明過渡綱領的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性的而是民主性的，同時未來中國在這個綱領之下進行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性的而是民主性的。

可是犀照這種企圖反對了自己

首先我們要知道，第四國際過渡綱領這個『橋樑』，不是專門爲落後國家架設的，倒是爲了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替美國的革命黨建築的。難道這些國家的革命，依托洛次基之意，也必須先經過一個『民主革命』嗎？當然不！所以過渡綱領的整個方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性的。因爲，托洛次基說：『無產階級的每一個鄭重要求，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每一個鄭重要求，不可避免地要超出於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與資產階級國家的範圍』(見『過渡綱領』)。由此可見，過渡綱領之提出與未來革命之社會主義性質不可分離。然則犀照一方面大批開列着『超出於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與資產階級國家範圍』的『過渡綱領』，另一方面又怒斥了中國未來革命之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說法，不是自相矛盾嗎？或者，犀照只是簡單地照抄着托同志的政綱，而毫未懂得其真意吧。

一九四八年，九，五日

斥全體又動軍官；士兵自選指揮員；授退伍士兵以土地；廢止常備軍；由工會編練工農民軍！

(五) 保障貧民生活：——成立各類消費者代表會，規定日用品價格，監督一切經濟活動，懲罰投機囤積；成立住戶聯合會，分配一切房屋；由國庫廣建房屋，交工會與住戶聯合會支配；清算沒收大官僚，一切發國難財，勝利財與內戰財者之財產，用以整理幣制，安定物價，興建工廠，由工人管理，以此切實救濟貧民；以單一的財產累進稅代替一切捐稅，革斥一切貪官污吏，官吏民選！

(六) 保障青年的求學與就業：——增加教育經費；大中學生一律公費；實施普及的義務教育；反對黨化教育；保障教師生活與學生營養；反對男女分校；畢業學生有充分就業機會！



(七)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糾察完全自由；——立即取消一切特務組織；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廢除保甲制和警管區制；切實保障各種自由！

(八)保證中國民族之對外獨立與對內自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反對美軍駐華；取消中美新不平等條約；否認一切外債；實行自主的保護關稅；沒收外商在華產業；讓臺灣人自治；保護國內弱小民族的完全平等與自決！

(九)保護蘇聯打倒史大林官僚政策：——反對作美國貓爪進攻蘇

讀者論壇

## 中共在機會主義道路上搖擺

### 三翻四覆的轉向

我們早就宣布過，史大林派共產黨的『國際政策』就是蘇聯官僚層的外交政策之一部份。這個官僚層利用各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情勢中，作無原則的左右傾以維持它在蘇聯所篡奪的政權。但是，它的右傾固是妥協，即左傾也是為謀取妥協的一種威脅的方式，而且每一步驟恰巧都是違背革命進展的。

就拿中國現成的事實來說罷，當一九二七年，革命正達到最高潮，主觀客觀條件都具備的時候，史大林派共產黨高低要保持國共合作的政策，強制城市工人和鄉村貧農俯首就範，等候屠殺。蔣介石叛離了，還要抱住汪精衛必待革命最後潰敗而後已。

這反革命的改變已經完成之後，它又不服氣似地跑到鄉村依附農民作盲目軍事行動，並宣布中國有與國民黨政權對抗的蘇維埃政權的成立。這時我們認為反革命已經勝利，革命黨只能用民主口號重新團結羣衆參加政治鬥爭，它稱我們為『取消派』，然而它的旨動政策却是取消了城市羣衆運動，放棄了一般的政治鬥爭。

大吹大擂的轟動一時的在江西鄉村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終於抵抗不了城市來的反革命進攻，於是又浩浩蕩蕩做『萬里長征』避居陝北。鄉村蘇維埃政權既靠不住，於是窮急計生又運動張學良實行兵諫。西安事變造成一個機會使周恩來得以相見蔣介石，披肝瀝膽；陳述苦衷，願竭誠擁護蔣介石的抗日，從此蔣介石就成爲衆所擁戴的民族領袖，抗戰的領導者。於是較前更卑劣的國共的合作政

策，又恢復了！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橫暴的進攻，震動了中國各階層，使得他們不能不羣起反抗。遲疑不決的蔣介石，因得共產黨之確實保證也宣佈抗日。此時共產黨如果還是革命的，正是大好機會集合城市與鄉村羣衆力量，站在全國範圍，發動羣衆的解放鬥爭，立足於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基礎上，領導抗戰，反對汪精衛的投降，反對蔣介石的妥協，反對他勾結美帝國主義及對羣衆解放鬥爭的敵視，並反對國民黨軍閥官僚假抗戰名義對人民的橫征暴斂，以爭取自己獨立的

政治領導地位，如有可能則由此走上奪取政權。乃共產黨此時不僅放棄了階級鬥爭，放棄了一般的羣衆運動，（只圖偷偷摸摸地做軍事運動），且取消了自己——取消蘇維埃區，將『紅軍』改號爲國民革命軍以隸屬蔣介石，宣布爲『徹底的』三民主義而奮鬥，並接受愛國主義，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實際上蔣介石至上！）

『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實際上一切服從蔣介石！）等口號，幫助蔣介石抬高威望，集中權力，加強軍事獨裁。如果過去的國共合作把蔣介石培養成立，則這次的抗戰合作便復活了他已經自行斷斷的政治生命，掩飾了他的反革命性及延續他的統治。

日本投降後，戰事結束了。全國都在普遍紊亂不安的狀態中，一般人民都希望從此有一個新的改革，以安定生活，恢復經濟，即蔣介石自己也覺得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此時共產黨如果還是革命的，正應該站在被壓迫羣衆鬥爭的方面，號召普選的人民代表會議



，建立以勞動羣衆為基礎的革命政權，以統一全國，結束國民黨的專政。乃共產黨不從下層去領導被壓迫羣衆的解放鬥爭，而走到上層去與美帝國主義代表、國民黨代表及其他政客做和平的談判，開分贓的政治協商會議。它正式宣告美帝國主義為友邦，馬歇爾為和平大使，三民主義為最高準繩，國民黨為第一大黨及承認國民政府的主權及蔣介石的領袖地位等，以此在羣衆中散佈和平幻想並讓馬歇爾與蔣介石可以有時間從容不迫的佈置軍事。有了這樣的宣告與承認，後來因地盤分配而被迫的決裂，便形成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的『叛亂』。這種無政治原則的單純的軍事行動，一方面放過了『勝利後』一個廣泛的羣衆鬥爭的浪潮，另一方面使蔣介石得以肆無忌憚召開他的國民大會，鞏固他的軍事獨裁。

### 新政協就是尋找政治出路向資產階級求援

中國本身的經驗，已經足夠證明，沒有城市工人的領導及被壓迫羣衆的鬥爭，沒有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建基於鄉村農民羣衆上的軍事行動是沒有出路的。這種軍事投機只有增加政治的混亂，助長反革命的炎威及加重羣衆的消沉。

但是共產黨為補救這種無出路，又來一個舊夢重圓：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五一號召）。這是軍事投機與政治投機雙管齊下的新政策。這表明鄉村無出路向城市資產階級求援，其結果只得到流亡香港那些紳士政客的喝采。

五一勞動節本是規定在這一天，全世界工人向全世界的資本家舉行一個總示威，這事本身就含有階級鬥爭與國際主義兩個意義，今史大林派共產黨拿來作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階級合作及政客拉攏的號召，這是公然的背叛，該死萬分！

把共產黨『五一號召』翻閱一遍，我們只見到其中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解除『工商界人士』的『困惑』，告知他們不要害怕：我們不作階級鬥爭，而是保護工商業，主張勞資兼利的，你們快來同我們開政治協商會議罷！

五一號召的開宗明義有這樣的話：

『在造謠公司中央社的騙人政策下，白區的人民對於解放區很模糊，對於新民主主義感到有點困惑；尤其是工商界人士

表現得更明顯』。

這裏我們看見史大林派共產黨自己供認它孤立於一隅（即所謂解放區），脫離了重要城市（即所謂白區）的羣衆，脫離了全國政治生活，致令白區人民在造謠公司中央社的『騙人政策下』，受不到它的宣傳和政治的影響。——『解決區還很模糊，對於新民主主義感到有點困惑』。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明顯看見共產黨五一號召的主旨就是要向『白區的人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說：你們不要疑惑我們還有什麼『共產』，『階級鬥爭』等事，我們現在完全改變了。我們『解放區』的職工是如何有犧牲精神，努力增進生產，實行勞資合作。請讓共產黨五一號召自己說罷。

『解放區的職工和經濟工作者，堅定不移的貫徹發展生產，繁勞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業政策和工運政策。（五一號召第八條）

『解放區的職工為增加工業品的生產量，提高工業品的質量，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而奮鬥，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須品供給市場。（第九條）

『解放區的職工發揚新的勞動態度，愛護工具，節省原料，遵守勞動紀律，反對一切怠惰，浪費和破壞行為，學習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第十條）

『解放區私營企業中的職工與資本家建立勞資兩利的勞資關係為共同發展國民經濟而努力』（第十二條）

『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被壓迫的民族工商業者，打倒官僚資本家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第十七條）

夠了，夠了！這個勞動法案完全從蔣介石那裏抄襲來的！我們惟恐『白區的人民』對共產黨還不完全瞭解，願盡這個義務，把『五一號召』幾乎逐條翻印出來，廣為宣傳！

資本家們！你們看共產黨解放區的職工多麼恭順啊！你們應該羨慕罷！

一定會有人說共產黨五一號召第十三條也注到職工生活：

『解放區的職工會與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職工適當的生活水準，舉辦職工福利事業，克服職工生活困難』。

殊不知從來資本家剝削工人都是用『增進生產』（不說增加